

殘夜不須眠

——論鄭孝胥晚期的政治詩作*

陳 仕 軒**

提 要

鄭孝胥晚期思想的意義尚未獲得學界充分的討論，特別是「夜起庵」時期（1926-1932）這段生命經驗正好落在「辛亥革命」以後、「滿洲國」成立之前的模糊地帶，容易使人遺忘，或是輕忽其學術價值。而鄭孝胥的抉擇自有歷史公評，放置於「知人論世」的解釋傳統裡無可避免地形成一道難題。據此，在理解政治、道德和文學可能帶來的研究限制以後，本文嘗試以新的觀察視角考察鄭孝胥晚期思想。從「辛亥革命」為遺老帶來的傷痛說起，再重新挖掘「北京政變」之於鄭孝胥的意義：鄭氏作為保衛溥儀離開紫禁城的主導者，終於見證原有的

本文 104.08.31 收稿，105.06.23 審查通過。

* 感謝特約討論人鄭雅尹的細心指教、學友李洛的寫作建議，以及諸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謹此致意。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三年級。

政治理想竟是如此遙不可及。事過境遷以後，將赴天津的鄭孝胥決意開啟最後一場政治追求，並具體反映在「夜起庵」的命名行動上。且看鄭孝胥如何拾回「夜起」，轉化為通向政治理想的技術，將是理解鄭孝胥晚期思想的重要面向妙門關鍵。

關鍵詞：鄭孝胥、辛亥革命、北京政變、夜起、晚期思想

Ye-Qi: Zheng Xiaoxu's Political Poetry

During His Later Life

Chen Shi-xuan^{*}

Abstract

During the latter part of Zheng Xiaoxu's life, his thought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especially the period from 1926 to 1932, after naming his house as Ye-Qi. However, Zheng's thought was mostly being ignored between the time of these two major events,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Manchukuo. Among academics, Zheng was generally denounced as a traitor to his country, which means the Han Chinese, for he served as Prime Minister of Manchukuo during the latter part of his life. Therefore, not taking political views and moral criticism into consideration, this thesis focuses only on the thought of Zheng's later life.

So far as Qing loyalists were concerned, it was noteworthy that they were deeply hurt by the Beijing Coup, and the sadness was way more tha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or any historical event. On the other hand, Zheng played a key role during the time of the Beijing Coup, for he was responsible for keeping

^{*} Master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Chi-Nan University.

Xuantong Emperor safe from abduction. Yet, after leaving the Forbidden City,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at time always frustrated Zheng. He then made up his mind to wait for the right moment to act in Tianjin. Meanwhile, Zheng kept practicing painstakingly, naming his house as Ye-Qi. The house name, Ye-Qi, represented him in the later part of his life, as well as his pseudonym; therefore, it had a great significance. To sum up, this thesis mainly discusses Zheng's political poetry and interprets his situation.

Keywords: Zheng Xiaoxu,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e Beijing Coup, Ye-Qi, thought during the latter period of Zheng Xiaoxu's life

殘夜不須眠

——論鄭孝胥晚期的政治詩作

陳 仕 軒

一、引論

1935年5月，鄭孝胥（1860-1938）將詩作寄示胞弟稚辛（1862-1946），自評個人出處境況乃「皎然進退自分明，中止休疑業未成。天道從來看後起，祇將白髮待還京。」¹ 明月依時變化，圓缺自成道理。詩人有他長遠的眼光及理想，不為外在喧囂劫奪一生執守的政治態度。鄭孝胥一生最具爭議之處在於1932年3月出任「滿洲國」² 國務院總理，無論本意是否出自延續清朝國脈，此舉一般認定是「親日」行動，有違民族大義。陳瀛一（1822-?）如此評述：「鄭孝胥之得名也，不以書，復不以詩。世獨以美書工詩稱之，斯固然矣。而於清季政事之起伏，固數數預謀，實一政客也。」以鄭氏政治作為排除「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的創作，徒留一般形式主義的「美書工詩」技術。³ 即使過去與鄭孝胥親近的同

¹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5冊，頁2584。

² 從「清遺民」的角度作同情理解，未必需要註明「偽」字。

³ 汪辟疆：《光宣以來詩壇旁記》，收入氏著，張亞權編撰：《汪辟疆詩學論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上冊，頁222。

光體詩人也有所慨歎，一如陳衍（1856-1937）「鄭海藏詩實有動人處，近作漸就枯窘，或身世使然」⁴之語，同樣無法輕易原諒鄭孝胥晚期的仕途抉擇，進而否決了後來的創作。於是乎，學界既有的討論彷彿延續前輩學者的論斷，讓鄭孝胥的晚期詩作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

鄭孝胥貴為同光體詩派魁首，其詩作在晚清民國的詩學語境裡一直具有相當份量。汪辟疆（1887-1966）以「玉麒麟」定名，自是肯定鄭孝胥的才性：「若就詩論詩，自是光宣朝作手。海藏一集，難可泯沒。孔子不以人廢言。」學人以為「詩」依然留有一塊純粹「論詩」的淨土，只是士人的抉擇時常挑起了晚清民族主義思潮的敏感神經。而汪氏處理「近代詩學」的歷史脈絡，當然無法迴避同光體詩人的學術貢獻，只是在評選「鄭孝胥」時，自身彷彿陷入某種焦慮，始終遠離了詩學話語的討論，未若陳三立（1853-1937）「天魁星及時兩宋江」之盛讚。而《光宣詩壇點將錄》以詩學成就排名鄭、陳二人應無爭議，評述鄭氏的內容卻是「急功名而昧於去就」，並將批評工作交由歷史：「茲仍舊錄，而並為著錄於此。」⁵即是給予鄭孝胥的詩學地位，卻未留下什麼說明文字。

陳衍雖多有微詞，亦直言鄭孝胥對詩界的影響相當可觀：「近來詩派，海藏以伉爽，散原以奧衍，學詩者不此則彼矣。」⁶對於技法的評論則言：「沈摯之思，廉悍之筆，一時殆無與抗手。」⁷陳衍與鄭孝胥論詩已久，儼然成為同光體的重要傳統。但陳衍的評論其實止於早年詩學：「鄭蘇戡專作高腔，然有頓挫，故佳。而亦少變化，更喜作宗社黨語，極可厭。近來行為益復喪心病狂，余與之

⁴ 黃曾樾：《陳石遺先生談藝錄》，收入錢仲聯編校：《陳衍詩論合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上冊，頁1019。

⁵ 汪辟疆：《光宣詩壇點將錄箋證》，《汪辟疆詩學論集》，上冊，頁68-69。

⁶ 陳衍：《石遺室詩話》，卷31，《陳衍詩論合集》，上冊，頁450。

⁷ 同前註，卷1，頁9。

絕交久矣。」⁸ 這段文字收錄在錢鍾書（1910-1998）的《石語》，記載內容是與陳衍在 1932 年陰曆除夕的對話。而鄭孝胥同年 2 月赴奉天，與日本密商滿洲國事宜，想來陳衍對鄭氏的不滿正在其親日作為。

顯然，詩人的志向與學人言談間的歷史形象有所衝突，而鄭孝胥一以貫之都是政治道路的追尋。其實在當時的學術社群裡也不乏鄭孝胥的支持者，不只是詩文的推崇，還有給予政治性格上的肯定。且看《鄭孝胥日記》1926 年 10 月 31 日的記錄，鄭孝胥偶然發現報紙上刊載的一首詩作：

於《東方日報》中見趙堯生一詩，題曰，《憑石遺寄海藏樓》：「前歲曾吟鄭君裡，櫻花紅白閉禪關。悠悠世事凭翻覆，落落詩流倦往還。誰識心雄萬夫上，無窮事在一樓間。未來天地從君卜，大海潮頭壁立山。」題一絕於詩後云：「欲將孤憤傲群賢，人定何堪說勝天。自是衰遲偷生者，汗顏翻為一詩傳。」⁹

趙熙（1867-1948）曾為他們在辛亥革命（1911 年）以後的境遇有此慨歎：「故人各各風前葉，秋盡東西南北飛。今日長安餘幾個，前朝大夢已全非……」¹⁰ 濃厚的敘別話語暗示了清遺民在新紀元的離散。由群體至個人，趙熙分別以詩寄至他人抒發感懷，其中一封請陳衍寄至「海藏樓」。詩作內容顯示趙熙對鄭孝胥人格與詩格的感念：即使遭逢世變也能屹立不搖，以為無人知曉鄭氏的雄心與他所自願擔負的歷史責任。當篇從海藏樓論詩的回憶寫起，「詩」與「事」相生、

⁸ 陳衍說，錢鍾書記：《石語》，收入陳衍撰，陳步編：《陳石遺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年），下冊，頁 2183。錢氏於此案曰：「時一二八滬戰方劇。」

⁹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4 冊，頁 2122。

¹⁰ 趙熙：〈讀石遺室詩話寄慨〉，收入氏著，王仲鏞主編：《趙熙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年），中冊，頁 349。

相感，表露了鄭孝胥的才氣以及作者的仰慕之情。¹¹ 然而，鄭孝胥卻是在 1926 年得見此詩，¹² 回應之「題後」詩已非「使人意激」，¹³ 詩人羞慚地回顧過去自己的性格、處事何以敵不過命運的安排，而「孤憤」至「衰遲偷生者」的轉變，道出了鄭孝胥近來的沉鬱。此刻在報刊上讀到趙熙的詩，心情不似當年「向來盛負氣，不自謂我非」¹⁴ 的傲氣，顯現一種「垂老從亡者，知為舉世非」¹⁵ 的頹喪。¹⁶ 有趣的是，鄭孝胥並未耽溺於「衰遲偷生者」的生命姿態，心裡仍有些許微亮的政治願景，由此定調了詩人的晚期風格。不久以後，時年 67 歲的鄭孝胥將赴天津，以「夜起庵」為屋舍之名，隱喻又一次政治理想的構築。

鄭孝胥一生與政治有著緊密的聯繫，屋舍往往伴隨理想築造於此，成為標明自我的歷史記號。從上海的「海藏樓」、天津的「夜起庵」至於長春的「柳下居」，正是展現了詩人不同時期的政治追求與實踐。本文欲探索鄭孝胥的晚期思想，並著眼於作出前往「滿洲國」抉擇以前的「夜起庵」時期（1926-1932）。這是一段值得重新探勘的斷代，至今尚有諸多歷史問題等待討論。過去學界對清

¹¹ 趙熙對鄭孝胥的追尋亦有〈訪太夷〉一詩為證：「所居相距五千步，獨自尋君獨自還。一院春風乾淨土，櫻花紅處似僧關。」見《趙熙集》，上冊，頁 282。結尾處對海藏樓周圍的景物描寫彷彿指向鄭孝胥其人，與歷史建構的形象截然不同。

¹² 據王仲鏞主編《趙熙集》記載，〈憑石遺寄海藏樓〉為趙熙 1914 年所作（頁 36）；鄭孝胥「題後」詩寫於《鄭孝胥日記》1926 年 10 月 31 日。就日記內容來看，應是初見此詩。

¹³ 沈其光《瓶粟齋詩話》：「讀樊山詩，使人意憚；讀海藏詩，使人意激；讀散原詩，使人意潔，讀綉綺詩，使人意謐。」見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18 冊，光緒宣統朝卷，頁 12938。

¹⁴ 鄭孝胥：〈送禮弟入京〉，收入氏著，黃坤，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頁 18。

¹⁵ 鄭孝胥：〈行嚴揖唐纓衛次公見和重九詩〉，《海藏樓詩（增訂本）》，頁 337。

¹⁶ 昔日嚴復（1854-1921）傳來詩人榜排名之事，鄭孝胥欣然留存於日記（1908 年 6 月 23 日）裡：「夏劍丞邀至九華樓，又陵、伯嚴皆至。又陵言：叔伊在京出詩人榜，無第一，以余為第二。評云，『恨無長篇，否則可為第一。』伯嚴第三，伯潛第四，易實甫第十，余人不能詳……。」如今，鄭孝胥看到自己在報上為人稱賞，心情判然有別。見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2 冊，頁 1146。

遺民的研究必然注意兩個關鍵時刻：辛亥革命（1911）與滿洲國成立（1932）。但是對他們來說，還有一場意外在心裡難以抹滅，即是發生在 1924 年的「北京政變」，又稱「溥儀出宮事件」。原定的「清室優待條件」保留清王朝的主權在紫禁城運作，但是 1924 年宣佈的「修正清室優待條件」則堅決廢除溥儀（1906-1967）皇帝尊號且以國民身分視之，從此清王朝轉向歷史而非當代政治。¹⁷ 辛亥革命殘留的傷痕未曾癒合，「北京政變」無疑是清遺民又一次重大的傷害——至少對鄭孝胥來說別具意義。若以《鄭孝胥日記》標示的一般時間劃分，「夜起庵」時期當以「將赴天津」的決定為起始，日記寫於 1926 年 11 月 30 日。¹⁸ 但是鄭孝胥生命歷程的序列暗示其移居的動機及築造「夜起庵」的情懷牽連著那一年的「北京政變」作為歷史見證者的直接經驗。試想鄭孝胥告別「海藏樓」的決定如何艱難？太多無法承認的歷史現實逼迫詩人的離去；辛亥革命的傷痛難以排遣，鄭孝胥在天津重鑄政治理想又是基於什麼原因？再說，「夜起庵」與「海藏樓」遙遙相對，另一個空間的構築及命名行動即象徵詩人欲通往目標必須實現的自我承諾。意料之外的是，鄭孝胥的烏托邦想像竟是透過一系列嚴整的技術鍛煉而築夢踏實。由此展開的討論，「夜起庵」時期之於詩人的生命意義卓然顯現，可以視為理解鄭孝胥晚期風格的重要進路。

¹⁷ 沙培德 (Peter Zarrow):「但從中國政治文化長遠發展的角度來看，溥儀之被逐出紫禁城、清朝儀典的停擺、以及皇帝紀年的廢止，在在都標示出帝制的終絕。」見氏著：〈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文化與歷史記憶：溥儀之逐出紫禁城〉，中國近代史學會，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主辦：「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學術研討會，2001 年 12 月 15 日，頁 2。

¹⁸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4 冊，頁 2125。

二、積恨：革命／遺民敘事的辯證

王汎森提醒我們「事件發展的邏輯」時常與「史家的邏輯」相反，需要「去熟悉化」(defamiliarized)，才能對歷史產生比較新的了解。¹⁹ 鄭孝胥一生歷經多少波折、成就多少志業，恐怕也是他自己始料未及。尤其是晚年接受了滿洲國總理的職務，批評者不得已將其放置在歷史的對立面，由此詮釋鄭孝胥過去行跡，彷彿一切作為都與最後的政治抉擇相關。誠如錢鍾書所言：「言固不足以定人，行亦未可以盡人也。……自非『知言』若孟子，亦姑且就事論事，斷其行之利害善惡，不必關合言行，追索意嚮，於是非之外，別求真偽，反多誅心、原心等種種葛藤也。」²⁰ 閱讀鄭孝胥的詩文、日記，嘗試擺落成見、遠離評價之難，以求理解字裡行間透露的心跡。由此開啟對話的可能，並非決然「翻案」歷史對鄭孝胥之公論，而是「還原」其人一生為晚年政治抉擇「遮蔽」之處。這份「遮蔽」來自「知人論世」的解釋傳統，或有「民族主義」的歷史傷痕，其間意義相當複雜，不可避免地成為一道難題。

辛亥以後，大清皇帝宣布「贊成」共和國體，得到了「優待清室條件」。時至「北京政變」以前，民國政權仍由前清大臣官吏把持，他們對於清朝依然眷戀不已。殘酷的是，紫禁城已非正統王朝，無能為力的清室成員也將為「遺民」，

¹⁹ 王汎森：「對某一個定點上的歷史行動者而言，後來歷史的發展的結果是他所不知道的，擺在他面前的是有限的資源和不確定性，未來對他而言是一個或然率的問題，他的所有決定都是在不完全的理性、個人的利益考量、不透明的資訊、偶然性，夾雜著群眾的囂鬧之下作成的，不像我們這些百年之後充滿『後見之明』的人所見到的那樣完全、那樣透明、那樣充滿合理性，並習慣於以全知、合理、透明的邏輯將事件的前因後果順順當當地倒接回去。」見氏著：〈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學》第14卷4期（2003年12月），頁183。

²⁰ 錢鍾書：《談藝錄》（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頁502-503。

只能依憑契約關係以維持現狀。²¹ 而多數清遺民在民國軍得勢後離開朝廷中心，選擇隱居上海、港澳、青島等地，基本上已不問政治。但從他們坐落的地點（租界）、留辮的行為來看，拒不承認民國正統的意向是相當明確。²² 清遺民驚覺於辛亥革命的爆發，守舊的生活模式也有適應新時代的用意。若從歷史意義來說，一般認為辛亥革命的價值來自「共和國觀念從此深入人心」，這個說法已非學界共識，權以「未完成的革命」定名之。²³ 事實上，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即指出這場革命其實並未對階級結構以及產權制度發生明顯變化，甚至政治影響也是相當有限。²⁴ 他們的討論聚焦在今日中國的規模如何完善繼承辛亥革命的成果，不約而同地給予「未完成」的評斷——既是批判也是期待。但「清遺民」的存在恰好證明了共和的理想絕非辛亥革命所能完成，租界彷彿虛幻空間，儼然將這個「失語」群體排除現實之外。²⁵ 因而「未完成的革命」的提法從清遺

²¹ 胡平生對清遺民與「清室優待條件」的關係有詳盡的敘寫，特別著重以「復辟」為政治訴求的心理。清遺民在民國初期的政治活動，胡氏指出：「民國七年十月至十一年六月，是徐世昌任民國總統時期，徐為著名的復辟派分子，即使做了民國總統，對於清朝、清帝仍眷戀不已，在他任內，優待清室條件自然得保無虞，更不會有促使溥儀遷出宮禁的舉措。」（頁 387）見氏著：《民國初期的復辟派》（臺北：學生書局，1985 年），頁 382-388。

²² 辛亥以後，清遺民在租界的活動成為研究的熱門課題。無論是作為古典文化的最後守望、文學為宗旨的結社活動，或是各自生活的經營模式等，不同的切入角度均帶來豐富的研究成果。相關研究參楊萌芽：《古典詩歌的最後守望——清末民初宋詩派文人群體研究》（武漢：武漢出版社，2010 年），頁 115-132；朱興和：《現代中國的斯文骨肉：超社逸社詩人群體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4 年）；周明之：《近代中國的文化危機：清遺老的精神世界》（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55-59 等論著。

²³ 章開沅對辛亥革命帶來「共和國觀念」的繼承有所評判，言談間存有「未完成」的期待。見氏著：〈辛亥百年遐思〉，收入周言，方翌編：《未完成的革命——辛亥革命論壇演講錄》（臺北：秀威資訊，2012 年），頁 18-20。

²⁴ 同前註。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不確定的遺產〉，頁 5-9。

²⁵ 羅志田：「民初多半生活上海的所謂『遺老』，其實就自成一『世界』。他們當然也不滿意時代的發展，但除少數認真捲入清朝『復辟』活動者外，多數人實際已不問政治，而過著一種帶有『大隱在朝市』意味的世外桃源生活。這些人的文酒過從之中當

民的心態觀察其實相當準確，他們理解的「民國」即是「敵國」，將其包括在外的「共和」則未有實現的可能。據此，「辛亥革命」與「清遺民」之間的關係及相關個案討論可以幫助學界回歸歷史自身去尋求其它解釋的路徑。

據《鄭孝胥傳》編訂的年譜來看：「八月武昌事起，先生急馳回任，途次上海，長沙已失，道梗不行，遂留於滬，隱居海藏樓，有續雜詩八首志感。」²⁶ 無法即時趕到歷史現場的鄭孝胥，只能將內心的情感化諸文字，幽居「海藏樓」並自我辯證著革命的真相。鄭孝胥前半生積極參與政治，雖然在「立憲運動」裡未若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1873-1929）二人的成就，但是從「預備立憲公會」的組織、號召過程裡，仍可以感受到鄭孝胥主張改革的激進態度。²⁷ 當革命消息從四面八方傳來，鄭孝胥的文字充斥無法在場的忿氣。且看 1911 年 10 月 27 日輪船駛往煙台時的紀事：

政府之失，在於紀綱不振，苟安偷活；若毒痛天下，暴虐苛政，則未之聞也，故今日猶是改革行政之時代，未遽為覆滅宗祀之時代。彼倡亂者，反流毒全國以利他族，非仁義之事也。²⁸

既是憲政改革的參與者，多少承認了清王朝的缺失，但鄭孝胥以為內部狀態尚未達到革命之時。民國軍的做法無法使中國富強，還有危害國土的危險，外族亦將趁虛而入。於是在清朝體制以外的改革，鄭孝胥甚以「失心瘋」論之：「以利己損人久成習慣之社會，而欲高談共和。共和者，公理之至也，矜而不爭，群而

然有大量的牢騷不平之語，但其所嚮往的目標、競爭的成敗，以及關懷的事物，其實與這一『世界』外的人頗不相同。」見氏著：〈新舊之間：近代中國的多個世界及『失語』群體〉，《變動時代的文化履跡》（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58。

²⁶ 葉參，陳邦直，黨庠周合編：《鄭孝胥傳》，收入周谷城主編：《民國叢書》（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滿洲圖書株式會社1938年版影印），第1編88冊，頁28。

²⁷ 徐臨江：《鄭孝胥前半生評傳》（上海：學林出版社，2003年），頁169-181。

²⁸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3冊，頁1352。

不黨之效也，此歲時人所能希望乎！」²⁹ 如此沉痛的言詞直指整個社會，始終無法理解這樣的理念竟是由「提倡革命，附和共和」的人來完成。

鄭孝胥慨歎一場不合時宜的事變倉促到來：「而舉國糜爛，我則為清國遺老以沒世矣。」³⁰ 至於個人的出處進退，鄭孝胥的一生總是盼望著時機。「海藏樓」的構築有其「避地待時之志」，³¹ 如今再次歸返上海，恍然覺察到歷史對自我意志的違逆：

時不我與，戰彌天於一棺，惜哉！未死之先，猶能肆力於讀書賦詩以橫絕雄視於百世，豈能徜徉徒倚於海藏樓乎！樓且易主，而激宕悠揚之嘯歌音響乃出於何處矮屋之中，未可知也。³²

面對民國軍的猖狂亂行，鄭孝胥不願「海藏」於此。文字的留存可能讓百世之人知曉他的心境，卻難以解決當前的困境，且革命掀起擾亂一切秩序的風暴，縱有詩名也是徒然。「海藏樓」作為理想的標記，鄭孝胥的政治期望卻因為革命面臨到延宕、銷毀的可能。火已及之，詩人憂慮的心緒化為陣陣恨語：「魄之將狂，魂來救之；魂魄俱狂，孰能救之？又舉遠鏡，見玉皇頂峰巒千迭，皆積恨耳。」³³ 只能透過資訊傳播得知革命消息的鄭孝胥，不敢想像清王朝的帝國洪業已然飄零。

事已至此，鄭孝胥自稱遁世離群，返回「海藏樓」展開隱逸、論詩的生活。閱讀詩文透露的「遺民」聲明，鄭孝胥隱然對於新的身分感到不適。當時局勢未

²⁹ 同前註，頁 1358。

³⁰ 同前註，頁 1353。

³¹ 同前註，頁 638。《鄭孝胥日記》1898 年 1 月 21 日記曰：「此一年中，棄江寧，就上海，實有避地待時之志。……然世局變態，思之已熟，尚不為造化小兒所給，況今日之斗筲乎。」

³² 同前註，頁 1353。

³³ 同前註。

定，他對孟森（1868-1938）說道：「世界者，有情之質；人類者，有義之物。吾於君國，不能公然為無情無義之舉也。……吾為人臣，惟有以遺老終耳。」³⁴「世界」與「人類」以「情」、「義」相互感通，放置在士人的現實處境即是強調「君國」與「吾」同樣有著難以割捨的道德情感。這段敘述指向了中國悠遠的歷史傳統，鄭孝胥知曉此刻士人應該擔負的倫理責任。³⁵但「遺民」畢竟是新時代尚未掃除的餘燼，鄭孝胥始終不與為伍，持續對抗著它。世變當年即有詩曰：「已坐虛名人欲殺，真成遺老世應忘。」³⁶直言「遺民」的身分將帶給他更多的困難，不會是解決現實問題的辦法；辛亥以後，不同時期的詩文常能見到鄭孝胥對「遺民」辭彙操作、接受的過程。一如「空將節義比斯人，竟作遺民有餘愧。」（1915）、「老夫雖遺民，未死火在炭。」（1916）、「流芳與遺臭，理欲方交戰。」（1917）、「日者橋邊休縱語，命中終恐是遺民。」（1922）、「老夫未合稱遺老，待撥江山反少康。」（1929）等，詩人晚年赴任滿洲國總理，亦有「劫後遺民吾尚在，卻看孤塔過遼陽。」（1932）的懷想。³⁷另一方面，鄭孝胥不願接受「遺民」稱號的原因還有對新時代的憤恨。尤其王朝的傾崩由民國軍主導，「新時代」即「民國」也，鄭孝胥心情是「與其坐以斷腸，無寧與匪決死。」³⁸甚而在日記裡發憤寫下一則歷史預言：「無明火燒世界，理不能喻，情不能感。必待糜爛之後，方有哀悔厭亂之日。」³⁹鄭孝胥以為民國軍不能了知國勢走向，以「革命」

³⁴ 同前註，頁 1356。

³⁵ 鄭孝胥在日記多次談論與晚明遺民有關的話題，其深知遺民傳統的形成，以及應該具備的道德作為。相關討論參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 147-155。

³⁶ 鄭孝胥：〈危樓〉，《海藏樓詩（增訂本）》，頁 222。

³⁷ 鄭雅尹嘗以「遺民自畫像：多重自我」為題，討論鄭孝胥與遺民身分的互動。見氏著：《幽靈·風景·現代性：同光體個案研究》（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年），頁 94-97。

³⁸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3 冊，頁 1354。

³⁹ 同前註。

為號召的行動終將無法成就「共和」的理想。⁴⁰ 再說，民國軍驟然打亂了鄭孝胥的歷史藍圖，王朝末日在他原先構想的發展史裡並不存在，於情於理也找不到合適的解釋。因此，「余與民國乃敵國也」⁴¹ 的想法呼之欲出，拒絕承認民國的情感基底「積恨」而來，隱喻著鄭孝胥未來的政治想像。

辛亥革命難以說服清遺民接受改朝換代的事實，顯現革命「未完成」的一個面向。朱興和的研究指出鄭孝胥在海藏樓隱居時期對於袁世凱（1859-1916）政治意圖（1911-1912）和一戰即將結束時的戰局判斷（1918）有一系列的失誤，評曰：「鄭孝胥本來沒有高超的政治才能，卻對自己缺乏清醒的認識，這是他後半生政治失足的重要原因。」⁴² 暫且不論其政治才能如何，約略可知鄭孝胥此時仍具有強烈的政治關懷。滿腹牢騷的鄭孝胥在索居期間並未獲得真正的平靜，只因革命的情勢不斷更新，自己卻是置身事外：「天下多事，能者自見之秋……而余獨袖手海藏樓上，似有天意不令人競爭之局者。」⁴³ 積恨如此，鄭孝胥在危樓裡揣想政治形勢，試著釐清歷史的面目：

人生種因得果，類由自取，余之造海藏樓，遂適為避世之地，此歲豈吾所及料哉。然余居樓中，味爽即起，寢不安席，食不甘味，運思操勞，絕非庸庸厚富之比；使余與聞世事，必有過人之處。⁴⁴

⁴⁰ 同前註，頁 1359。《鄭孝胥日記》1911 年 11 月 25 日記曰：「有自稱『民國團』投書毒詈者，亂黨之鄙野如此，於共和何望。」又 1911 年 11 月 29 日記曰：「革黨反對君國，於外國則不敢犯，此即甘心受制於外人之現象也。嗚呼，亡矣！」

⁴¹ 同前註，頁 1705。

⁴² 朱興和：《現代中國的斯文骨肉：超社逸社詩人群體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4 年），頁 277-278。

⁴³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3 冊，頁 1358。

⁴⁴ 同前註。

「海藏樓」的構築本為「避地待時之地」，劃分鄭孝胥前半生政治理念與實現，既是結束也是開始。無奈時局難料，突如其來的革命限制了鄭孝胥其後可能的政治行動，違背「海藏」本意。即使身在「異托邦」(heterotopias)⁴⁵也無法切斷與現實空間的聯繫。時人所稱：「蘇庵居海藏樓，避不見客。」⁴⁶鄭孝胥的思慮不能張揚，受困於過去作為理想標記的「海藏樓」裡，心情格外壓抑。無止盡的自我對話取代了基本的生活機能，其關切的不只是革命的動盪，亦從歷史的幻滅省思自己的處境：

蓋所種者實為用世之因，而所收者轉得投閑之果，可謂奇矣。……余今日所處之地位，於朝廷無所負，於革黨無所忤，豈天留我將以為調停之人耶？窗外陰雲甚黑，吾將訊之鬼神。⁴⁷

面對已然變調的歷史，影響了自身的政治鴻圖。時局與個人生存的劇烈變動，鄭孝胥對革命的緣由提出近乎譎妄的歷史解釋：「使余與聞世事，必有過人之處。」

⁴⁵ 吳盛青：「從實際生存狀態來看，遺民在租界中的園林游冶與樓居生活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被看做是異托邦的存在，它們與大上海的綺麗繁華以及斬釘截鐵大步向前的現代社會有天然的反抗與角力關係，在政治與文化意味上與民國主流社會壁壘分明。」見氏著：〈亡國人·採珠者·有情的共同體：民初上海遺民詩社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4期（2013年4月），頁51。「異托邦」(heterotopias)源自米歇·傅寇(Michel Foucault)的界定，有別於「烏托邦」(utopia)的虛構特性，指同時與現實空間並存的另一個真實存在的空間。據此，學界研究有將位在租界的遺民生活圈以「異托邦」的概念聯繫的說法。又見王標：〈空間的想像和經驗——民初上海租界中的清遺民〉，《中國近代史》第7期（2006年7月），頁70-79；理論出處參(法)米歇·傅寇著，陳志梧譯：〈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脈絡)〉(Text/Contexts of Other Spaces)，收入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1994年)，頁399-409。

⁴⁶ 胡思敬：「予既蒞滬，則從陳考功伯嚴訪故人居址。伯嚴一一為予述曰……又曰『蘇庵居海藏樓，避不見客。……』」見氏著：〈吳中訪舊記〉，《退廬文集》，卷2，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宣統甲子刊本)，第45輯，頁216。

⁴⁷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3冊，頁1358。

狂言似地聲明民國軍的難以捉摸，關鍵在於自己的缺席。鄭孝胥以為「海藏樓」非久留之地，革命的後果還是等待「調停之人」的善後。且看「我去長沙月餘日，武昌亂作如兒嬉。使我率師下金口，舉手撲滅何能為。」⁴⁸ 辛亥革命是一次又一次殘忍的回顧，歷史本不應該如此發展。往昔的幽靈被召喚回來，詩人開始幻想、造作，成為征戰的領袖。「以詩存史」的內容受到「情」的干擾而擴大了敘事空間，可以想見，鄭孝胥的獨白未盡於呢喃細語，詩文間流露的情懷已然超越了傳統對於「遜清遺老」的期待，不止於朝向滿清的眷懷繫念而已。⁴⁹ 無論戰事如何發展，他都渴望參與其中，不以避世為樂，甚或相信自己是亂世的終結者。又言：「出奔歇浦實異國，七年相見嗟子遺。偷生日久空自恨，春秋不作宜無詩。」鄭孝胥的敘別話語透露了自己現時的焦慮，而詩文對「歷史」的拆解儼然揭露了詩人無法面對「現實」的癥狀。在內心「積恨」不已的「遺民」敘事裡，鄭孝胥有意汲取時間與記憶的資源，醞釀下一階段的政治行動，藉以恢復原有的歷史。⁵⁰

⁴⁸ 鄭孝胥：〈答余堯衢〉，《海藏樓詩（增訂本）》，頁 288。

⁴⁹ 胡平生：「所謂遜清遺老，絕大多數是漢人，僅有極少數的漢軍旗人。民國初年，他們都抱亡國之痛，散居於全國各地……悲憤的程度不下於喪失『祖業』的滿洲人，對於清朝眷懷繫念，無以復加。」見氏著：《民國初期的復辟派》，頁 53-54。

⁵⁰ 從鄭孝胥在辛亥以後的敘事來看，單以「遺民」二字似乎無法凸顯詩文裡流露的情感。王德威有感於「後殖民」論述（post-colonialism）的新興霸權而自鑄「後遺民」（post-loyalism）一詞，其目的亦有從遺民論述的窠臼解放之義。背景的建立著眼於清末民初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王氏指出遺民在應該肩負的倫理承擔之外，更為複雜的是面對失落的欲望主體可以具備的生命姿勢以及如何將之內化、錯置、恢復的手段。見氏著：〈後遺民寫作〉，《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出版，2007年），頁 23-70。「後遺民」的出現可以幫助學界釐清過去「遺民」論述可能的限制、正視清遺民身處在現代情境的震驚程度。據此觀察，鄭孝胥與「遺民」的聯繫似乎不能簡化，值得學界進一步探索。

三、負氣：歷史現場的見證與歸返

朱大可（1898-1979）如此評述鄭孝胥在辛亥以後的悲憤之音：

辛亥以後，激昂愈甚，蓋其睽懷君國，俯仰身世，皆有不能已於言者，固與江湖羈旅韋布憔悴之士異其旨也。⁵¹

「海藏樓」自始得不到安寧，詩人反覆進行「民國／敵國」、「革命／共和」的自我辯證，如此「遺民」情境顯然存在一種張力。相對於其他遺民的憔悴心理，鄭孝胥尚有用世之心，最終抉擇是在 1924 年 3 月出任內務府總理大臣，追隨清朝殘存的小朝廷，正式介入復辟政治活動。⁵² 由此推想，「海藏樓」不符合當前的政治期望，無法裝載鄭孝胥的「積恨」與「負氣」，而這些情感卻是他一生政治行動的重要動能，孟森如是記述：「海藏調出處之故，情隨境變，未可執也，獨負氣不自謬耳。」⁵³ 鄭孝胥手筆規劃的歷史藍圖總為世變所累，這些記錄成為他不能洗淨的污漬。詩人的性格在日記裡如實地呈現，可以規劃一條政治情感的軌跡作為參照。有趣的是，鄭孝胥一直毫不掩飾地表露宏大的政治期望。且看 1905 年的自白：

⁵¹ 朱大可：〈海藏樓詩之研究〉，《海藏樓詩（增訂本）》，頁 650。

⁵² 《鄭孝胥日記》1924 年 3 月 3 日記曰：「詣弢庵，弢出示錄諭，云：『宣統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欽奉諭旨：特派鄭孝胥為總理內務府大臣，畀以全權，以資整頓。欽此。又欽奉諭旨：鄭孝胥加恩賞戴頭品頂戴。欽此。』……」見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4 冊，頁 1987。

⁵³ 孟森：〈海藏樓近刻詩序〉，《海藏樓詩（增訂本）》，頁 7。

從此以後，若中國迄無振興之日，則終老山林，不失為潔身去亂之士；倘竟有豪傑再起，必將求我。雖埋頭十年，至五十六歲出任天下大事，依然如初日方升，照耀一世。⁵⁴

國勢如此，時年 46 歲的鄭孝胥寫下了疑似棄官歸田的想法，其實是對自己功業的肯定。此時鄭孝胥的眼光已然投射到十年以後，確信還有「依然如初日方升，照耀一世」的結果。然而，56 歲的鄭孝胥竟處在革命殘留的創傷裡，意料之外的歷史事件不斷考驗著詩人負氣的心理。前文所述，辛亥革命在他眼中儼然是一次不完整的歷史：當「改革」為「革命」取代，詩人無法在貧瘠時代有所作為的時候，便將一切複雜的心緒化約為暴力的「文本」記號。⁵⁵ 文學敘事特許詩人的創作欲望，這確切反映在海藏樓隱居時期撰寫的日記與詩作，醞釀著個人理想的再次召喚，使得日記裡的「預言」彷彿「戲語」。

1924 年 10 月 23 日，又一次十年過去，鄭孝胥在日記張貼大篇幅《中華報》的報導：「馮玉祥等組織中華民國軍、根本改造國家通電……」大致內容是說馮玉祥（1882-1948）有感於「國家建軍，原為御侮，自相殘殺，中外同羞」，其一生最重要的「北京政變」已悄然發生。⁵⁶ 鄭孝胥對此尚未作出評論，但是連續幾天密切在日記裡關注馮玉祥等人的消息：24 日讀《京報號外》記下「吳（吳佩孚）不意馮之入京，疑通電為捏造者；馮復敬電，求其同意停戰。」；25 日馮玉祥通電說明「祥等武人，不諳政治，痛民生之益蹙，懼國破之無日，爰敢不揣固極，一本良心所見」的《建國大綱》；11 月 2 日《星報》載京師治安維持會「議

⁵⁴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2 冊，頁 975。

⁵⁵ 王德威：「隱含在傷痕裡的是一項肉體證據，指向身體曾經遭受的侵害，指向時間的流程，也指向一個矛盾的慾望——一方面想要抹銷，一方面卻又一再重訪暴力的現場。在檢視個體的傷痕的同時，記憶被喚醒，一個隱含的敘事於焉成形。」見氏著：〈傷痕書寫，國家文學〉，《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臺北：麥田出版，2011 年），頁 244。

⁵⁶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4 冊，頁 2020-2021。

和」通電、吳佩孚（1874-1939）申明己志，回應「天禍中國，喪亂相尋，張作霖實為禍首」，並承諾「若夫政治問題，佩孚願放成見，聽候海內賢豪、各省代表為公平解決，絕不敢飾非易暴，號為不擾民而實致民於水火之中」……⁵⁷ 直到 11 月 5 日「忽楊蘇拉來報：馮軍三百餘人入宮，神武門已閉，宮中消息不通」之時，鄭孝胥的態度才明顯轉為積極。⁵⁸ 日記寫道：「繞地安門，適遇十數車出門北行，望車中人似為帝後，被馮軍押出禁城。」方知宣統皇帝為馮玉祥逼出紫禁城。其後，鄭孝胥密謀「以醫生往視上，稱疾移入病院，或可脫險」不成，期望段祺瑞（1865-1936）幫忙：「許上移居東交民巷，暫避意外危險。」鄭孝胥憂心忡忡，即使得到段祺瑞「皇室事，余全力維持保護，並保全財產……」的回覆，依然表示「視其行事若何，猶難恃以無恐」。⁵⁹

溥儀為「中華國民軍」逼離紫禁城，對清遺民來說無疑是重大的打擊，幾乎勝過辛亥革命帶來的影響，儼然是一次真正的改朝換代，意識到民國的到來。至少鄭孝胥的體會相當深刻，有詩為證：

乘回風兮載雲旗，縱橫無人神鬼馳。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無此奇。
是日何來蒙古風，天傾地坼見共工。休嗟猛士不可得，猶有人間一禿翁。

60

⁵⁷ 同前註，頁 2021-2025。

⁵⁸ 同前註，頁 2022。《鄭孝胥日記》1924 年 10 月 28 日記曰：「弢庵來，咨宮中保護之策：余曰：『試求英、日二國，得數十人駐神武門，足矣。』得上海來電，云：『宮廷庵否？稜、爾愷、承幹。』即電復曰：『上安。』……」約略可見鄭孝胥之於北京政變的觀望態度。

⁵⁹ 同前註，頁 2025-2026。

⁶⁰ 鄭孝胥：〈十一月初三日奉乘輿幸日本使館〉，《海藏樓詩（增訂本）》，頁 323。

世變再次推翻原來的歷史想像，鄭孝胥這次在歷史現場見證了「溥儀出宮事件」的始末，更是促成溥儀移往日本使館的重要推手。⁶¹「青史」既為一般帝王將相史也是鄭孝胥私人的歷史藍圖，清王室離開紫禁城已然為「奇」，還參與了如此驚險的「告別」過程，對鄭孝胥來說確實經歷「天傾地坼」的變動。⁶²而日記的詳盡描述，彷彿回應著過去在「辛亥革命」的缺席——「手持帝子出虎穴」者正是「人間一禿翁」，鄭孝胥真正證實了自己有恢復歷史的本領。本質上，「北京政變」之於清遺民的歷史意義至關重要，若是讓溥儀在條約之外的情況下離開紫禁城，意味清皇室與民國政府並非過去協定的對等關係。⁶³軍閥的逼近吹亂了清王朝僅存的一絲氣息，驗證民國已然到來的事實。而鄭孝胥親身參與了清朝最後一位皇帝的保衛行動，其帶來的震撼自是不言而喻。若「辛亥革命」真是一場「未完成」的革命，沙培德（Peter Zarrow）對「北京政變」的評價頗有總結的意味：「這最終且無以借鑑之中國帝制歷史的一頁，卻是辛亥革命未竟事業

⁶¹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4冊，頁2030-2031；梁敬錚：「……向使當日鄭氏未到，或其策不為溥儀所納，則溥儀歷史固當重寫，而偽滿『康德皇帝』之一名詞，即可能不存在。」見氏著：〈記偽滿「康德皇帝」〉，《傳記文學》第14卷2期（1969年2月），頁54。

⁶² 《鄭孝胥日記》1924年11月29日記曰：「余至醫院，慮汽車或不聽命，議以上坐馬車；又慮院前門人甚眾，乃引馬車至後門。一德國人持劍，從一看護婦，引上下樓，開後門，登馬車。余及一僮驂乘。德醫院至日使館有二道，約里許，一自東交民巷轉北，一自長安街轉南。余叱御者曰：『再赴日使館！』御者利北道稍近，驅車過長安街，上驚叫曰：『街有華警，何為出此！』然車已迅馳。余曰：『咫尺即至。馬車中安有皇帝？請上勿恐！』既轉南，至河岸，復奏上曰：『此為使館界矣。』遂日使館，竹本、中平迎上入兵營，弢庵亦至……」見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4冊，頁2022。

⁶³ 「優待清室條件」即多次強調大清皇帝是以「辭位」的方式將政權轉移至民國。並在第一款直言：「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尊號仍存不廢，中華民國以待各外國君主之禮相待。」見《臨時公報》（1911年12月26日），收入周光培主編：《中華民國史史料四編》（揚州：廣陵書社，2010年，北京臨時政府中央行政部編），第1輯。

的一個必要的收場白。」⁶⁴ 據此，在「清遺民」的研究視域裡，「北京政變」的歷史意義可以投入更多的關注。

結局已定，溥儀經由鄭孝胥的安排來到日本使館，並於 1925 年 2 月 23 日喬裝潛往天津的日本租界，此時的溥儀意氣風發，決心在政治上有所作為。據王慶祥的考察：「乙丑年二月初二日（1925 年 2 月 24 日），對溥儀來說這是個大吉大利的日子：俗稱『龍抬頭』。當時溥儀把自己比作『困龍』，他要奮飛，重振『大清王朝』的雄風。」⁶⁵ 寓居天津七年成為溥儀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時期，對於「小朝廷」的作為有了更多的自我見解。值得注意的是，溥儀的奮起竟也牽涉了鄭孝胥恢復歷史的欲望。且看鄭孝胥與段祺瑞有關「優待條件」的談判未成，溥儀的發言即展現了一次政治獨立宣言：

鄭孝胥曾經拍過胸脯，說以他和段的關係，一定可以把優待條件恢復過來……後來段祺瑞許下的空口願不能兌現，使鄭孝胥大為狼狽。對鄭孝胥的微詞就在我耳邊出現了。……當時，我並不知道，在前一個回合中失敗的羅振玉，和這些反鄭的議論，有什麼關係。但是，我確實對鄭孝胥有了冷淡……⁶⁶

身為策劃溥儀出宮至日本使館的關鍵人物，鄭孝胥自信能掌控全局。無奈談判破裂，讒言遍布，鄭孝胥聲勢不如從前；此時羅振玉（1866-1940）意圖爭取溥

⁶⁴ 沙培德：〈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文化與歷史記憶：溥儀之逐出紫禁城〉，頁 2。

⁶⁵ 愛新覺羅·溥儀遺稿，李淑賢提供，王慶祥整理注釋：《愛新覺羅·溥儀日記》（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36；溥儀：「有一次，我騎到紫禁城外的筒子河邊上，望著角樓和城堞的輪廓，想起了我剛離開不久的養心殿和乾清宮，想起我的寶座和明黃色的一切，復仇和復辟的欲望一齊湧到我的心頭，不由得心如火燒。我的眼睛噙著淚水，心裡發了誓願，將來必以一個勝利的君王的姿態，就像我的進關的第一祖先似的，重新回到這裡來。」見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北京：群眾出版社，2014 年），頁 150。

⁶⁶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頁 151。

儀的信任，甚至改寫了「手持帝子出虎穴」的主詞，損害鄭孝胥的名譽。⁶⁷ 再說，溥儀「出洋」的決心日益強烈，鄭孝胥始終不以為意。可以想見，鄭孝胥在「小朝廷」漸無容身之處，最終決計出京。溥儀如是回憶：「於是，鄭孝胥終於有一天鬱鬱地向我請假，說要回上海料理私事去，我當時還不明白他的意思，也沒挽留，他就一氣跑了……」⁶⁸ 兩人的關係至此有了微妙的變化。

鄭孝胥「決計出京」的決定隱然抗議自己在「小朝廷」的待遇。期間有人多次勸其入京，而日記存一說法可以看出鄭孝胥的態度：「有避，未能來。」⁶⁹ 溥儀背離皇族傳統的成長干擾了鄭孝胥恢復歷史的決心，有意避居上海的做法也確實得到他善意的回應。據周明之的描述：「溥儀在日本使館時，東渡日本的計劃不能施行，曾一再傳旨令鄭北上，出面交涉。鄭以不即不離的方式應付，沒有立即應命，益使溥儀覺得他是不可少的人才。」⁷⁰ 其後，來到天津與「小朝廷」會合時，鄭孝胥將持續地進行恢復歷史的計畫，預示尚未鳴放的王道理想。⁷¹ 溥儀以為鄭孝胥來到天津以後「受到歡迎和日益增長的信賴」，且理想能切合溥儀的心思。⁷² 只是鄭孝胥的遠景更為宏大，已然無關乎溥儀的想法。且看《鄭孝胥日記》1925年3月14日的記載：

⁶⁷ 同前註。溥儀：「我從他（羅振玉）的自我表白中得到的印象，不僅他是這場風險救駕的大功臣，而且相形之下，鄭孝胥成了個冒功取巧的小人。」

⁶⁸ 同前註，頁152。

⁶⁹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4冊，頁2036。

⁷⁰ 周明之：《近代中國的文化危機：清遺老的精神世界》，頁148。

⁷¹ 「王道」是其後滿洲建國的精神和指導方針，鄭孝胥設想的烏托邦。相關討論見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2009年），頁330-356。

⁷²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頁190。

上語：「將來國號，即稱中華帝國亦無不可。」此語必自徐良所稱，乃康有為之邪說，孝胥但云：「俟他日討論此事。」⁷³

溥儀的皇族身分貴為清遺民復興的最後期望，只是在兩人的互動裡，隨著成長以後的留學夢、移宮頤和園、優待條件的修訂，乃至於建立「中華帝國」等意料之外的判斷，鄭孝胥似乎另有打算，無法表示完全的服從。然等待恢復的歷史不能容忍任何妥協，故在日記裡稱之「邪說」。

從詩人的情感軌跡來看，時年 66 歲的鄭孝胥延續著「依然如初日方升，照耀一世」的美夢，性格已然決定了他的命運。即使「行在」期間多次往返上海與天津兩地，但從詩文可以看出，鄭孝胥決意將「天津」作為又一次實現理想的據點。1925 年 11 月 26 日有詩言志：

海上有孤月，流光遍人寰。世人不知敬，謂月光以寒。獨有愛月者，中宵起盤桓。願從月入海，萬頃輕波瀾。月光受之日，造化良無端。乘時復為日，舉世萬驚看。哀彼無知子，沉迷在其肝。孰能回日月，愚智還相安。⁷⁴

詩人既是「愛月者」亦是「孤月」，顯示孤芳自賞的心理。而內在的寂寞卻在「愛月者」的奮不顧身之中流露出來。月亮彷彿一種想像的自我，遠離塵間、不為世人所知，卻是極具影響力又無所不在。於是乎，在後半段將日月合併為一，並表明月亮實為主導，隱約感覺到潛藏在「孤月」裡的力量，即是詩人亟欲傳播的理想。鄭孝胥埋怨世人不能理解其中道理，甚或不給予支持，殊不知日月乃一切根本，便勝人間無數愚智。據此，「孤月」將鄭孝胥「一生負氣」的風格完滿呈現，

⁷³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4 冊，頁 2045。

⁷⁴ 同前註，頁 2073-2074。

似乎預告了自己即將展開最後的政治追求。然「孤月」只存在於黑夜，詩人墜入、沉迷其中，遂成為鄭孝胥實現理想的完美起點：「夜起庵」。

四、夜起：鄭孝胥晚期思想之主導

本文引論曾引述一則 1926 年 10 月 31 日的日記材料，鄭孝胥偶然在《東方日報》讀趙熙的詩作：「……誰識心雄萬夫上，無窮事在一樓間。未來天地從君卜，大海潮頭壁立山。」據此，前面章節的討論旨在還原鄭孝胥在歷史情境（辛亥革命、北京政變）裡的心情表述，因而詩作內容描述的人物其實並不陌生，只是向來為滿洲國的背景遮蔽。鄭孝胥「自是衰遲偷生者」的回應雖然不見往日負氣，卻可以從「夜起庵」時期的紀事發現一項計算精密的行為蘊蓄於內，以政治的本體論為樞要，顯現豐富的晚期思想意蘊。

1926 年 12 月 15 日，午刻始抵天津。這是鄭孝胥「賞假一個月」⁷⁵ 的歸返，至此以「夜起庵」為長居。求索詩人決意居住於此的心情，尚有〈將赴天津〉為證：

羈旅心知異守官，暫歸猶覺別家難。看花隔歲休驚老，投袂臨歧敢避寒？
婚嫁粗完身可去，兵戈間阻事無端。小窗短榻裁容膝，誰作高樓百尺看！

76

寄身他鄉未若一般執行官務，必須耗費極大心力。只緣鄭孝胥知曉暫居於此亦是通往「王道」理想的必經過程。由「暫歸」至「別家」，以舊地變化慨歎時間

⁷⁵ 同前註，頁 2122。《鄭孝胥日記》1926 年 11 月 6 日記曰：「請假一月赴滬，奉面諭：『賞假一個月。』」

⁷⁶ 鄭孝胥：〈將赴天津〉，《海藏樓詩集（增訂本）》，頁 338。

的流逝；而「兵戈間阻」決斷了人生行路，乃若非有此身。在「將赴天津」的決定裡回盼過往，隱約有總結個人境遇的想法。無情的年歲提醒著歷史的不可逆行，投袂而起的詩人盼望著「高樓百尺」，此時甘願沈潛於「小窗短榻」。據此，在鄭孝胥的晚期思想找到了凝聚的動力，即是詩人與時間的抵抗、追逐。

溥儀在回憶錄裡特別說道「鄭孝胥的理想」，約略可知詩人何以不肯放任時間的流逝：

有一次，（鄭孝胥）在給我講《通鑒》時，話題忽然轉到了我未來的「帝國」：「帝國的版圖，將超越聖祖仁帝一朝的規模，那時京都將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長安，一在帕米爾高原之上……」說時是禿頂發光，唾星四濺，終於至四肢顫動，老淚橫流。⁷⁷

鄭孝胥面對正史的有感而發，期許想像的帝國最終可以得到正名。由此看來，這位總務重臣心裡的「高樓百尺」是極為高峻、廣闊。辛亥革命殘留「未完成」的傷痕以及北京政變「親歷其境」的震撼，始終期盼「照耀一世」的夢想成真。而這些心情在溥儀面前竟是完全的坦白。若不以 1932 年成立的「滿洲國」為後見之明，鄭孝胥的言論即是一種「烏托邦」的先驅者想像，此時的溥儀只想重登皇座，無論是大清帝國或是「中華帝國」。領導如是，鄭孝胥至此確立了「小朝廷」共同的施政方針。⁷⁸

鄭孝胥在政治上得到了實踐理想的良好位置，背後隱然有強大的意念作為支撐，值得注意的是，「夜起庵」的命名行動完善顯現鄭孝胥晚期思想的重要面

⁷⁷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頁 190。

⁷⁸ （德）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佔主導地位的烏托邦常常是作為某一個人的願望和幻想首先提出的，只是後來才被合併為更廣泛的群體的政治目標……即使在一個似乎孤立的個體賦予其群體的烏托邦形式，說到底，也可以正確地把這歸於那個群體，因為他的成就符合群體的集體衝動。」見氏著：《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頁 211。

向。且從「夜起」的名號說起，這是鄭孝胥在天津刻意維持的作息。《鄭孝胥傳》附〈軼事〉記道：

先生生平，自奉簡樸，其暮年生活，尤有規則，蓋自追隨行在移居津沽時，即開始夜起習慣，《夜起庵賦》，即作於此時，是為民國十四年秋間，先生年六十六歲。其序曰「予戌而寢，丑而興，歲一星矣。乙丑孟秋，賃宅依於行在，率其素而不懈，遂名之夜起庵」云云。以上略述其夜起之由來，所謂戌時（午後九時）就寢，丑時（午前三時）起床，蓋紀實也。嗣後來滿「建國」以後，北地苦寒，且冬季天明甚遲，午前三時，猶在半夜中，而先生仍習之如常，老而彌堅，此亦習久成自然歟？⁷⁹

鄭孝胥嚴以律己，甚或以「夜起」為住處名，顯示通向目標的決心。如此嚴謹的作息延續到天寒地凍的滿洲國，依然不改其志。換言之，鄭孝胥「夜起」的行為貫串了詩人最後的政治追求，讓這場「命名」可以理解為詩人晚期思想的妙門關鍵。材料透露的訊息尚可推知鄭孝胥至天津時期才開始「夜起」行為，其實是一次「重啟」的決定。若往前追溯鄭孝胥「夜起」的緣由，便會發現一道私密的歷史痕跡。汪辟疆有此記載：

吾嘗見孝胥為其姪孫彥綸書箋一詩云：『山如旗鼓開，江自南塘下。海日生未生，有人起長夜。』此為其早年居福州南臺山之作，凌厲無前，寄意深遠。細細味之，頗有劉越石聞雞起舞之意，而其人之不甘寂寞，低首扶桑，真可以窺其隱微矣。此詩未收入《海藏樓集》，蓋不輕示人也。

80

⁷⁹ 葉參、陳邦直、黨庠周合編：《鄭孝胥傳》，頁 149-150。

⁸⁰ 汪辟疆：《光宣以來詩壇旁記》，頁 224。

這是鄭孝胥一次私人的記錄，不足為外人道也。詩人覺醒於長夜，天尚未明，既是「愛月者」奮起之時，亦存有以「孤月」自喻的想像，等候、發明、操控旭日的到來。因而汪氏評說：「此詩太夷甚自負，以為有英雄氣也。鄭在滬時，嘗自署名為夜起，本此。」⁸¹ 學人的記錄以及《海藏樓詩》裡多篇詩作證實了詩人早年即有「夜起」的行為，而晚年重拾「夜起」之名號，奮而不解，隱約可以感受鄭孝胥求其放心的意念，盡在「負氣」之外。⁸² 其後，鄭孝胥「夜起」的名號在天津時期成為一則公開的宣言，銘記於屋廡，表現為一種刻意雕琢自我的技術。質言之，「夜起庵」之於鄭孝胥實有「莫忘初衷」之想望，無奈最終離開天津的動機牽涉滿洲國的性質，幾乎隱沒了詩人這段時間的沈潛。⁸³

「夜起庵」築造以前，鄭孝胥時常往返於「海藏樓」。期間詩人與「夜」的相處凝結成詩，盡是無限寂寞之音：

⁸¹ 汪辟疆：〈讀常見書齋小記〉，《汪辟疆詩學論集》，下冊，頁 446。

⁸² 張煜以為鄭孝胥的「夜起」可以追溯至光緒十六年在北京與福建出現的「夜坐」詩，如〈官學雨中與陳笙陔夜坐〉、〈八月二十八日夜坐時將出都〉、〈聽水樓偕伯夜潛夜坐〉等詩。張氏如是說道：「隨著清王朝的日薄西山，夜起後來竟然成了鄭孝胥的生活習慣，而他自己也樂意將之作為憂心國事的某種象徵。」見氏著：《同光體詩人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5 年），頁 229-230。本文期望進一步指出「夜起庵」時期的「夜起」是一次重啟行動，詩人用心不止於憂心國事而已。

⁸³ 陳衍對鄭孝胥之「夜起」即有此揶揄：「清季國事日非，蘇戡中宵即起，托詞鍛煉筋骨，備萬一起用上陣，實就其妾宿也。為妻所破，詬誶之聲，聞於戶外。蘇戡大言欺世，家之不齊，安能救國乎！」這段往事可追溯至 1902 年，陳衍的記憶似乎有意刪除鄭孝胥晚期重拾「夜起」的意義。見陳衍說，錢鍾書記：《石語》，頁 2185-2186；近人研究甚或以「神秘主義」解之：「鄭孝胥『夜起』牌大葫蘆中貯存的就是『鶴知夜半』的丹藥——只不過這粒靈丹妙藥是海藏樓主清夜用來自療心病，因而秘不示人，遑論公開出售也。」見張榮明：〈「鶴知夜半」：鄭孝胥的隱秘情結〉，《從老莊哲學至晚清方術：中國神秘主義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288。

海上無山可似歸，登樓詩卷暫相依。投閒轉覺憂危集，行意誰令去住違。
俱老人書真是業，孤吟松竹自成圍。今宵招得春申月，欲為知音論見幾。

84

鄭孝胥的個人理想發端於對時局的危機意識，因而孤獨與焦慮相雜，非詩卷所能平息，且邀海上明月相論將要發生之事。就詩作內容來說，詩人彷彿安排一場極為慎重的告別儀式。鄭孝胥將要離開上海，即將割捨的「詩作」與「住處」代表著過去行跡。詩人迫切地尋覓心中的「歸宿」——生命政治的最後實現。「海藏樓」已然無法完滿於鄭孝胥的美夢，直至今日「夜起庵」定名以後，詩人與「夜」相處之餘，雖有流露時光推移之歎，卻轉向了積極的生命活動，與過去的「夜起」不可同日而語：

落月好顏色，東方殊未明。徘徊若相顧，欲逝轉含情。殘夜成元賞，祁寒見獨行。此生如此已，誰與惜平生？⁸⁵

在天津殘夜裡，詩人與無畏嚴寒的「落月」相遇，並從「相顧」至「含情」的過程裡感受到時間的匆匆流逝。詩人恰以「落月」興發，並在末聯留下對一生際遇的反省，自命孤獨又不辭風雪。只是現身於殘夜之時便無人可以感同身受。據此，不妨對讀「夜起庵」時期另一首詩作：

殘宵孤坐將何待，暗裏流光亦可驚。夜色蒼蒼收欲盡，卻看墜月入天明。

86

⁸⁴ 鄭孝胥：〈海藏樓夜集〉，《海藏樓詩（增訂本）》，頁 334。

⁸⁵ 鄭孝胥：〈十一月十七日四鼓翫月〉，《海藏樓詩（增訂本）》，頁 338。

⁸⁶ 鄭孝胥：〈十五夜看月落〉，《海藏樓詩（增訂本）》，頁 344。

可以發現，在「殘夜」裡看「落月」儼然成為詩人「夜起」的意趣。詩作呈現詩人有所待的「夜起」，以及對月亮的隱喻與換喻。既然無處尋覓知音，便將自己看作自己的知音，靜候「孤月」潛翳天明。有趣的是，「夜起庵」時期的鄭孝胥又何嘗不是一次通往天明的漫長等待？對時局「暗裏流光」的警覺、將夜色「收欲盡」的無盡執著，讓這份等待有了理由，從此找不到平靜，隱含著對於未來的展望。

鄭孝胥的詩集在刊行流佈的過程中有多次重刻。據校點者的考證：「鄭孝胥曾刻《海藏樓詩孝胥乙丑至丙子所作》，作為《海藏樓詩》之卷十一至卷十三，紅色印本。」⁸⁷ 詩人有意將天津「小朝廷」至出任「滿洲國」總理時期視為人生裡的一次重要回顧，由此歸納鄭孝胥的晚期思想是相當明確。圍繞在「夜起庵」的詩作，往往透露了鄭孝胥晚期的沈潛與焦慮，顯現一種難以解決的矛盾。且看一首詩題即為「夜起庵」的作品：

一別高樓寄此庵，五年況味更誰諳？枕堪待旦天難曉，薪已將然臥豈酣。
滄海徑歸真上策，舊京入夢奈空談。丹青自寫靈臺狀，莫信人誇蔗境甘。

88

旅居天津已達五年，詩人心情仍是心神不寧，「夜起」是自律，但可能也有不成眠的緣由。時局動盪未定，故難眠；人生至此尚不能從心所欲，亦難眠也。真正令詩人不安的其實還有與「海藏樓」的告別：過去「高樓」埋藏一段不該如此發展的歷史、隱而未見的傷痕，而一切難解之心緒只能寄託在「夜起庵」。⁸⁹《海

⁸⁷ 黃坤，楊曉波：《海藏樓詩（增訂本）》，前言。

⁸⁸ 鄭孝胥：〈夜起庵〉，《海藏樓詩（增訂本）》，頁 381。

⁸⁹ 《鄭孝胥日記》在 1930 年 1 月 29 日徒有「作《夜起庵》詩」之句，後附詩作全文，似為〈己巳日記〉作一總結。見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 4 冊，頁 2268。

藏樓詩》詩注有記：「相者謂余當有晚遇。」⁹⁰ 詩人在寫作的當下難以想像自己未來際遇如何，詩注即是事過境遷以後的一次回顧，驚覺於「昨日之詩」作與「今日之我」的對照。〈夜起庵〉敘寫的即是詩人的沈潛與焦慮，即使取得政治上的優勢也無法保證理念的完成。正是表面上的志得意滿，讓詩人在夜起時分挖掘出背後的虛無與荒涼：「丹青自寫靈臺狀，莫信人誇蔗境甘。」可以推想，即使鄭孝胥對「夜起庵」的命名行動展現了實現政治理想的決心，「夜起」亦顯現一種刻意與「自我」作對的想法，過程的辛酸難以言說，詩人仿若安排了一場通向烏托邦的荊棘之路。⁹¹

從文學文本透露「夜起」的自覺行為來看，鄭孝胥確實是不負其名。陳曾壽（1878-1949）即有詩贊曰：

……嚴整性所耽，雞鳴日孳孳。屬作夜起圖，此意誰能知？精金淬百鍊，事會無窮期。夜衣不遑寢，逆旅真吾師。⁹²

詩作內容具體展示了鄭孝胥「夜起」時的刻苦耐勞。其以「嚴整」的態度肅清一般耽樂之性，「夜起」行為切斷了常人的生活機制，重新規劃屬於「個人」的自處空間，慎其獨也。丁卯年末，曹經沅（1891-1946）味爽見訪。鄭孝胥詩曰：

⁹⁰ 「晚遇」一事可能為出版時增加。據此，時間將推至印行詩集（卷十一至卷十三）的1936年，當年鄭孝胥已辭滿洲國國務總理大臣職務。這段文字可以支持「夜起庵」時期之於鄭孝胥生命歷程的重要性。見黃坤，楊曉波：《海藏樓詩（增訂本）》，前言。

⁹¹ 一如嚴志雄曾關注到錢謙益（1582-1664）晚期的自我期許。雖然未有「病榻消寒」之時，鄭孝胥的「夜起」同樣顯現詩人晚期難得的積極面向。見氏著：〈自我技藝與性情、學問、世運——從傅柯到錢謙益〉，收入王璦玲主編：《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主體意識與社會——文學篇》（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年），頁413-450。

⁹² 陳曾壽：〈為蘇戡作夜起圖即祝其七十初度〉，收入氏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蒼虬閣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178。

中夜起待旦，初非欲人知。好我且信我，可感孰若斯？味爽聞叩門，是子決不疑……。⁹³

陳曾壽的稱許並非個案，與鄭孝胥親近的友人多擇「夜」拜訪，加強說明了「夜起」的宣言已得到諸多肯定。雖然並非鄭孝胥的原意，其間蘊藏私人的追求，但還是相當歡喜友人的拜訪。箇中滋味難以言說，詩人大致講述了「夜起」的外在妙用：

夜起既有年，斯道良可久。頗同獻曝心，願以遺吾友。晦明轉移間，造物露樞紐。人身小天地，吐納等難朽。清明常當令，昏惰詎能糅。神完形不敝，聊用却老醜。死生雖繫命，操縱或在手。終時幸無疾，何必千歲壽。⁹⁴

在殘夜裡創建自己的「小天地」，並透過個人修養以保有清明之心境。鄭孝胥儼然傳授了一套晚年自我琢磨的技術：「夜起」促成詩人在混沌世界裡劃出一道私密空間，透過操縱、訓練令氣息能隨時調整，並以清明的狀態維持神形完全、無懼老朽。這些技巧在日記裡的紀事則是加以系統化，成為一套定名為「練魄制魂說」的工夫論：

人生始化曰魂。既生魂，陽曰魂。不能練魄則多欲，不能制魂則多思。多欲多思則流蕩忘返，良知本性皆淹沒於多欲多思之中，永無見道之日矣。……吾自辛亥至今二十二年，半夜即起，坐以待旦，乃得練魄制魂之說。《孟子》所謂養心寡欲，《周易》所言無思無為，皆不外此。⁹⁵

⁹³ 鄭孝胥：〈曹纘蘅味爽見訪〉，《海藏樓詩（增訂本）》，頁350。

⁹⁴ 同前註，頁351。

⁹⁵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5冊，頁2468。

這套技術成文於 1933 年 6 月 26 日，亦是鄭孝胥「夜起」之集大成也。「魂」與「魄」皆需要透過鍛煉、克制的手段，還原「良知本性」、求其本心矣。辛亥以後，詩人「昧爽即起，寢不安席」的不平之氣竟是「夜起」的契機。可以推想，革命傷痕在鄭孝胥心裡到底潛藏了多久，如何在之後的人生道路上開啟漫長的修煉。

告別「海藏樓」，定居「夜起庵」。鄭孝胥在天津的生活一直是以「羈旅」的態度警醒自己，而「夜起」已是鄭孝胥面對有限生命的一種「練魄制魂」的技術。直到 1932 年寓大連文化臺九十五番，亦有詩曰：

殘夜不須眠，獨起誰同調？老我莫徬徨，片月猶年少。愚公欲移山，恃有子孫在。老夫當及身，移樓著人海。⁹⁶

又見一次「夜起」時刻，詩人依舊呢喃著天下無人與他同在。從天津至東北以來作息未有太多改變，此次「夜起」作詩卻再次複習了自己的孤獨。鄭孝胥屆時年近 73 歲，將出任滿洲國總理視為通向理想實現的舞臺，當「愛月者」成為「孤月」本身，詩人已然東山再起，重新喚起過去對政治的憧憬。但是，詩人在現實層面強烈感受到歲月並不待人。得到權位以後，鄭孝胥在滿洲國期間轉為積極入世，任「王道」理想遍傳各地，詩注卻有「於收京後必更造海藏樓」之想，或是緬想起過去恬淡論詩的日子。回憶起辛亥時期的憾事：「人生種因得果，類由自取，余之造海藏樓，遂適為避世之地，此歲豈吾所及料哉……」據此，鄭孝胥在完成「依然如初日方升，照耀一世」的政治美夢以後，內心的盼望便是在理想國瓦解之前，重建「海藏樓」，最終確立個人的一席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從「夜起庵」的發想到理想的完成，鄭孝胥為此寫作兩篇〈夜起庵賦〉試遣其衷。前篇寫於乙丑孟秋（1925 年），序文直述命名緣由「賃

⁹⁶ 鄭孝胥：〈十二月廿六日天未明〉，《海藏樓詩（增訂本）》，頁 401。

宅依於 行在，率其素而不懈，遂名之曰『夜起庵』。」賦作內容張揚了詩人的「負氣」，心情卻是徬徨不定，無法安居於此：

納舉世於斯夜，繫獨寤乎一室……夜之象也則靜，其德則曠，冶萬物為本體，示造化之恆狀，時惟大人，觀乎物始，玩一氣之消長，羌中夕而屢起，清明兮在躬，屋漏兮相爾，制乎未發之原，操乎無形之裏，非茲庵之可託，幾何而不為南溟之徒。⁹⁷

天地萬物皆在暗處調養生息，而詩人執迷於一切平靜以後的黑夜。此時，鄭孝胥的期待尚未有政治的具體落實，只能化為「夜」的頌歌，許下構築「夜起庵」的初衷。由此對照乙亥年（1935年）的續作：「夜起二十餘年，有類於先憂者，然獨樂之不倦，豈必果志於天下者乎，乃為後賦以自釋。」鄭孝胥當年辭退滿洲國國務總理，以此總結了過去積累的政治期望、稱頌「夜起」的效果：

……惜此良夜，寒彩未沒，夜寒漸長，深入沈沈，驅夢履覺，萬端奚侵，謂我心憂，謂我何求，卻老還少，吾將焉度，空桐自竄，天下方亂，長夜漫漫，將何時旦。⁹⁸

如今面對黑夜，詩人與之交融，在滿洲國彷彿體現了「夜」的幽深以及「冶萬物為本體，示造化之恆狀」的本領。即使恢復了過去殘缺的歷史，至今無法告別的仍是動盪未定的時局。這個歷史的大哉問難以作答，鄭孝胥亦於心無愧。最終，無論「滿洲國」結局如何，歷史自有評判。從鄭孝胥的眼光投射出來，國家的存在已然完滿了詩人想像的烏托邦世界。

⁹⁷ 鄭孝胥：〈前夜起庵賦并序〉，《鄭孝胥傳》，頁93。

⁹⁸ 同前註，鄭孝胥：〈後夜起庵賦并序〉。

五、結論

「夜起庵」時期之於鄭孝胥晚期思想的意義尚未獲得學界充分的討論。這段生命經驗正好落在「辛亥革命」以後、「滿洲國」成立之前的模糊地帶，容易使人遺忘，或是輕忽其學術價值。而鄭孝胥一生充滿爭議：「辛亥革命」前後尚能以「賢臣」、「遺老」身分稱之；進入東北以後則淪為「漢奸」，從此無法得到公允的評價，如何理解鄭孝胥成為文學史上的難題。在理解政治、道德和文學可能帶來的研究限制以後，「鄭孝胥」的爭論同樣需要一個新的觀察視角。本文即是為此作出一些嘗試，期望能開啟新的討論空間。

辛亥革命帶來的影響自不待言，對於懷抱「復辟」期望的清遺民來說，「北京政變」可能是他們生命裡更為重要的歷史經驗。至少鄭孝胥的「見證」值得注意，這是延續革命「傷痕」以後的又一次衝擊。「夜起庵」的築造便來自於此，其複雜的心緒顯現在同時期的詩文裡，成為重新理解鄭孝胥必須掌握的材料。其次，「夜起庵」的命名行動逐步鍛鍊為一種技術，宣告詩人為最後一次政治追求所立定的決心。學人關注「夜起」，常為鄭孝胥一生負氣、熱衷功名的性格引導，進而連結至出任偽職的決定，如此則難以明白「夜起」的內在理路，以及最終完成「練魄制魂說」的學說意義。然而，不同時期的「夜起」亦須分明：若早年的「夜起」單純指向「其人之不甘寂寞」，鄭孝胥在天津時期重新拾回「夜起」、構築「夜起庵」，其間意義又如何理解？「滿洲國」是鄭孝胥烏托邦想像的最終實現，對於「夜起庵」期間的沈潛與焦慮時有回顧，在詩人的記憶裡卓然顯現不同於其他時期的歷史價值。

從「海藏樓」至「夜起庵」，龔鵬程教授有此評說：

海藏樓與夜起庵，遙遙相對；抱器懷質，遜藏上海，是為海藏；皤然一叟，匍匐東北，又非夜起而何？⁹⁹

相較於滿洲國時期的「柳下居」，鄭孝胥心裡是相當明白上海與天津分別成就了不同的自己，在生命經驗裡別具意義。據此，雖然鄭孝胥在「滿洲國」收穫了最後一次政治成果，其「王道」思想也成為當時的精神和指導方針。但論及鄭孝胥的晚期思想，「夜起庵」時期的沈潛應當成為主導。¹⁰⁰ 從現實情況來說，「夜起庵」時期正是「小朝廷」前途未卜之時，只能在民國與外國之間等候歷史的審判。然而，越是困頓之時，越能引發詩人之「興」。且看「天道從來看後起，祇將白髮待還京」，鄭孝胥從「傷痕」與「見證」之間尋得平衡，決心重拾初衷、接受自我的考驗。詩人精確地將一切準備就緒，最終完成理想，快意落筆「述意」之詩。當一切事過境遷以後，鄭孝胥已然不負個人奉行之道，縱有歷史罵名，於我何有哉？

⁹⁹ 龔鵬程：〈論晚清詩——雲起樓詩話摘抄〉，《近代思想史散論》（臺北：東大圖書，1991年），頁156。

¹⁰⁰ 《鄭孝胥日記》1937年8月24日記載：「攜五丁、菊十、小猛、小蘭同至王道書院，檢書數冊，又鈔〈夜起庵賦〉。」；同年9月5日記載：「使商務支店來試灌留聲片，為夜起庵誦文、誦詩、誦詞，共五片。」見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第5冊，頁2683、2685。以上材料可知在滿洲國時期，從「夜起庵」發揮而來的思想確實為晚期之主導，又可能與「王道」學說有所關聯。暫且筆記於此，期待來日的追索，豐富鄭孝胥從「政治詩作」(political poetics)至「政治詩學」(political poetry)的內涵。

參考書目

一、傳統文獻

- 《臨時公報》，收入周光培主編：《中華民國史史料四編》，揚州：廣陵書社，2010年，北京臨時政府中央行政部編，第1輯。
- 陳衍著，錢仲聯編校：《陳衍詩論合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
- 陳衍撰，陳步編：《陳石遺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
- 鄭孝胥著，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 鄭孝胥著，黃坤，楊曉波校點：《海藏樓詩（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 趙熙著，王仲鏞主編：《趙熙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
- 胡思敬：《退廬文集》，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宣統甲子刊本，第45輯。
- 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蒼虬閣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汪辟疆著，張亞權編撰：《汪辟疆詩學論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全本》，北京：群眾出版社，2014年。
- 愛新覺羅·溥儀遺稿，李淑賢提供，王慶祥整理注釋：《愛新覺羅·溥儀日記》，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 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
- 葉參，陳邦直，黨庠周合編：《鄭孝胥傳》，收入周谷城主編：《民國叢書》，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滿洲圖書株式會社1938年版影印，第1編88冊。

二、近人論著

-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出版，2007年。
- 王德威：《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臺北：麥田出版，2011年。
- 朱興和：《現代中國的斯文骨肉：超社逸社詩人群體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4年。
-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2009年。
- 周言，方翌編：《未完成的革命——辛亥革命論壇演講錄》，臺北：秀威資訊，2012年。
- 周明之：《近代中國的文化危機：清遺老的精神世界》，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9年。
- 胡平生：《民國初期的復辟派》，臺北：學生書局，1985年。
- 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 徐臨江：《鄭孝胥前半生評傳》，上海：學林出版社，2003年。
- 張煜：《同光體詩人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
- 張榮明：《從老莊哲學至晚清方術：中國神秘主義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
- 楊萌芽：《古典詩歌的最後守望——清末民初宋詩派文人群體研究》，武漢：武漢出版社，2010年。
- 錢鍾書：《談藝錄》，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
- 羅志田：《變動時代的文化履跡》，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
- 龔鵬程：《近代思想史散論》，臺北：東大圖書，1991年。
- （德）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

三、單篇論文

-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學》第 14 卷 4 期，2003 年 12 月，頁 177-194。
- 王標：〈空間的想像和經驗——民初上海租界中的清遺民〉，《中國近代史》第 7 期，2006 年 7 月，頁 70-79。
- 吳盛青：〈亡國人·採珠者·有情的共同體：民初上海遺民詩社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 4 期，2013 年 4 月，頁 46-61。
- 沙培德 (Peter Zarrow)：〈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文化與歷史記憶：溥儀之逐出紫禁城〉，中國近代史學會，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主辦：「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學術研討會，2001 年 12 月 15 日。
- 梁敬錚：〈記偽滿「康德皇帝」〉，《傳記文學》第 14 卷 2 期，1969 年 2 月，頁 51-57。
- 嚴志雄：〈自我技藝與性情、學問、世運——從傅柯到錢謙益〉，收入王璦玲主編：《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主體意識與社會——文學篇》，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 年，頁 413-450。
- (法) 米歇·傅寇 (Michel Foucault) 著，陳志梧譯：〈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 (脈絡)〉 (Text/Contexts of Other Spaces)，收入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1994 年，頁 399-409。

四、學位論文

- 鄭雅尹：《幽靈·風景·現代性：同光體個案研究》，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 年。

